

从“摇着打”到“走着打”

——改革开放 30 年“话”变迁

本报记者 温素威 邓晓霞



身处快速发展的时代,道别变得频繁和寻常。30 年前,父母亲朋、恋人 对远行者的叮咛是“一定要写信来”; 上世纪 90 年代后, 离别的嘱托变成 “常打电话”。如今,书信、电话、短信、电邮、MSN、QQ 总有一款适合离者 抒发别情,道声平安。这就是我们每 个人都能感受到的通信变迁。而从 “摇把子”电话、电报、寻呼机到“大哥 大”的全身而退,又何尝不是另一种 惜别? 只是,移动电话及互联网等通 信手段的出现,使变迁融入传承,让 消失成就永恒,告别也没有了遗憾。

通信业是基础性、先导性产业, 有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神经系统之称, 其敏锐的触觉和传导功能,使其成为 聚焦变革的最佳视角。30 年来,通信 的发展对整个社会宏观面目的改变 深刻久远,对百姓生活的浸润和记录 鲜活温暖。

行业记忆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通信业的 发展有几个节点。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曾剑秋博士将其定义为瓶颈期、发展 期、变革期。曾教授说:“改革开放以来,通信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把普通 消费者的需求作为基本服务对象,从 而使整个产业呈现勃勃生机。”

1978—1985 年 灰色记忆

1978 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 0.38%,不及世界水平的 1/10。 每 200 人拥有电话不到 1 部,比 美国整整落后 75 年。

80 年代初,外国投资者到马鞍 山钢铁公司谈投资项目,只愿意住在 南京,因为当时该公司只有 7 条电话 线路可用。该市一位副市长感慨地 说:“当年,我们出门从来不敢掏名 片,因为人家的电话都是七八位数 了,我们的只有五位! 为此我们失掉 了多少投资啊!”

一叶知秋。何止马鞍山,全国各城 市皆如此,广大的农村百姓更不知电 话为何物。那时,北京至乌鲁木齐的 长途电话,接通率不足 3%,全国长途 电话有 50%接不通。在北京,到电报大 楼打电话的人甚至带上午饭排队。国际

通信更加落后,有些外国投资者甚至 坐飞机到香港去进行国际联络。他们 称中国是没有电话的国家。

经济已驶入快车道,通信产业的 瓶颈制约更加显著,成为国民经济中 的薄弱环节。

曾剑秋教授打了个比方:电话瓶 颈问题就像改革开放前的餐饮业,一 方面人们没钱“下馆子”,另一方面想 “下馆子”的人吃饭难。这种情况下,通 信产业的市场化程度极低,电话往往 同特权、奢侈性消费联系在一起,尚没 有进入日常消费领域。而一方面是通 信业的垄断经营,另一方面是体制上 的产品经济模式和国家贫穷落后现 况,因此,开放通信市场无从谈起。

1985—1994 年 红色记忆

1985 年以来,中国通信产业的 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速度。

从 1989 年至 1999 年,年增长达 到 43%。

1992 年,中国的电话用户已达 到 1000 万,1998 年增长到了 1 亿。

除了固定电话之外,街头公话, 无线寻呼(BP 机),移动通信“大哥 大”、互联网通信逐渐出现。

1990 年前后的三四年间,百姓积 蓄已久的通信需求火山式爆发。谈及 缘由,原北京网通新闻发言人李立涛 先生说,生产力被释放出来,人们对信 息渴求、对沟通渴望,最典型的是农 村。当时农民根据当地特点总结出各 自的生意经,诸如想致富先种树、想致 富先养猪等等,后来发现,即使“种” 了“养”了,运不出去也富不了,于是“要 想富先修路”成为新民谣。再后来老 百姓又发现,光有路还不行,因为他们 要把产品介绍给需要的人,于是与外界 进行信息沟通的愿望强烈,“要想富先 通电话再修路”的口号叫响。

爆增的通信需求让电信人难以 招架。装机难,难到什么程度?原北京 市话局赵局长告诉记者,那时候,一 张原本免费的电话装机申请表,在黑 市上竟卖到 80 元。

如今 30 岁往上的人,对从楼上 飞降下来的黑色皮线也许还有记忆, 那是不得已而架架的临时线路。它们

密如织网,通信职工称之为“皮线 墙”,戏言即使有人从楼上摔下来也 不会丧命。通信部门已竭尽所能,怎 奈设备落后,资金匮乏。

1990 年,国家对初装费作出明 确规定,即原则上按收回建设成本 收取,标准暂定为 3000 至 5000 元。 采访中,曾教授特别提到一些人对 初装费存有误解,他说:“初装费并 非中国首创,在通信网建设初期收 取较高初装费,是许多国家的通行 做法。而事实上,初装费政策作用巨 大,它使我国仅用十几年时间就走 完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与 此同时,在收入分配方面,国家对通 信部门实行著名的“三个倒一九”政 策。产业政策的调整使通信业改变 瓶颈地位,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之 一,发展速度创世界之最。

这期间,一方面固话用户数量激 增,另一方面,站立街头的“黄帽子” 公用电话和腰揣 BP 机、手持“大哥 大”的时尚男女已成城市风景。

90 年代后期,移动电话市场一 路高歌猛进,数量呈几何级数递增。 到 2000 年达到 8526 万户,数量超过 寻呼用户。进入 21 世纪,号码显示、 短信功能的出现让手机击中寻呼“命 门”。寻呼老矣,手机为王。

1994—2008 年 绿色记忆

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截至 2008 年 10 月底,中国电话用户总数 超过 9.78 亿户。手机用户在电话用 户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达到 64.1%,与 固定电话用户的差距拉大到 2.76 亿 户。

2007 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达 1.82 亿人,预计 2008 年将达 2.44 亿 人,网民数量仅次于美国。

现在,如果被问及“每天做的第 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是什么?”许多 人的答案是“开关手机或者开关电 脑”。移动电话及互联网参与百姓生 活程度可见一斑。

1994 年,中国联通杀人竞争,移 动电话山花烂漫。

1998 年,信息产业部成立。电信 行业政企分开。

1999 年,中国电信业务分拆。相

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出现。

2002 年,中国电信南北分拆,进 一步打破垄断。

2008 年,新一轮的电信业重组,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分 天下。

李立涛先生告诉记者:“这一时 期,互联网通信给通信技术、通信业 务带来的变革可谓翻天覆地。而另一 方面,通信行业的改革重组一轮轮展 开。通信产业处在变革创新时期,企 业正努力由传统运营商向综合信息 宽带运营商转型。整个产业呈现生动 活泼局面。”

消费者乐享其成。各种优惠、各 套餐花样迭出,价格产品极大丰富。

有学者说,产业链,产业网皆不 足以概括通信产业现状,通信产业是 一个产业生态系统,因为没人知道这 里会生长出什么,也无法预料生长出 来的“东西”又会带来什么。

当记者问及手机的变化趋势时, 曾剑秋教授说:“现在的手机只能叫 移动电话,它还只能实现人与人的通 话。真正意义的手机还应实现人与 物、物与物的对话。这种实现不会再 用 30 年了。”

世界上第一份电报的电文是:上 帝创造了何等奇迹! 展望中国通信业 前景,我们要说:奇迹还会发生。

百姓讲述

王本海:过去用“摇把子”电话, 现在用手机

61 岁的老人王本海,老家在山 东菏泽市辛集镇王桥村。1968 年,他 应征入伍到安徽,那时跟家里联系, 只能通过写信、发电报。

1979 年,王本海复员,回到镇上 当了文化站站长。“当时文化站只有一 台‘摇把子’电话,要抓住把手摇上 半天,才能接通总机。那时没有电话 号码,都是通过总机转。打个长途,要 从乡总机转到县总机,再转到外地总 机。信号很差,听不清楚。”直到 1982 年,文化站才安了拨号电话。

1994 年,儿子到上海上大学,“我 都是骑车十几里地到镇上邮局,给儿 子寄信、寄钱。”王本海的老伴田玉真 说。第二年,大队派了全村第一部拨号 电话,安装费 3600 块钱,全村的人围过 去看新鲜。田玉真试着给儿子打了个 电话,当熟悉的声音通过黑色的话筒传 到耳边,“简直跟做梦似的,太神奇了。”

1996 年,王本海家里安了电话, 花了 1000 多块钱。当时村里才三户 人家家里有电话。“那时家里像传电 室一样,晚上吃完饭,不时会有电话 打进来,让帮忙叫乡里乡亲,开始几 个孩子图新鲜,抢着接电话,谁接电 话谁负责去叫人,住得远的要跑好几 里路,后来几个孩子都不敢去接了。” 2000 年后,村里才开始大规模装电 话,现在村里有 90%的人家都装上了 电话,没装电话的人家有小灵通。

1998 年儿子毕业,买了个传呼机, “有事就给他打传呼,让他回电话,不 像以前那样找不到人,方便多了。”

随着电话的普及,电报业务很快 萎缩。何英姿并入营业组,后来又转到 大宗组。宋师傅分到营销组。“现在 一个月仅有不到 10 封电报,都是发到 特别偏远的农村。到邮局打电话的也 很少。信件中商函占大部分,真正意义上的 家书也很少了。”宋师傅说。

题图为北京 V 信卫星通信地球 总站。北京通信信息博物馆提供

菏泽以牡丹闻名,村里很多人做

花苗生意,原来卖花苗,要开车四处 跑,问别人要不要,只能碰运气,现在 好了,打个电话到当地园林局问问是 否需要就行,获取信息更快了,节省 时间、节省油钱。

刘青:我 1995 年开始上网,那时 几乎没有中文网站

刘青可谓中国最早在家中上网 的网民,1995 年,20 出头的她已经可 以在家中上网了。“那时候基本上没 有中文网站,聊天只能去雅虎。绝大 多数时间是在和外国人聊,有美国 的、法国的、新加坡的,还碰到过在 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遇到一个 台湾同胞,当他知道我是在家中和他 网聊时,惊讶得不得了,直说没想到! 没想到!”

刘青说,那时还只能拨号上网, 有麦克但没有摄像头,可是她能看 见对方。她还回忆道,那时,我清华 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学计算机的同学, 都不惧路遥骑着车子跑到我家来看 新鲜。最好玩的一次经历是,我和一 位中国男孩儿聊了半天,后来发现 我们俩都在北京,后来我们说赶紧 下线,打电话算了,多贵呀。那个时 候,每个月的上网费用大约是 300 多 元钱。没有包月呀,套餐呀一说。比 现在贵多了!

宋仁信:以前有急事只能到邮局 发电报、打长途,现在再不像从前了

宋仁信师傅 1974 年进入北京市 东四邮政支局。刚进邮局时,宋师傅 送了 5 年电报,后改收电报,直到 1998 年电信组并入营业组。“当时有 急事只能发电报,每天来报有五六百 封,去报有四五百封。”宋师傅回忆 道,“那时银行之间的往来,各部委 与地方联系都通过电报。”宋师傅指 着旁边的何英姿说,“她以前可是电 报能手,在北京市邮局比赛中得了第 一名,一分钟能打 150 多组呢。”

何英姿 1994 年到东四邮局做执 机员,发电报。“那时学习成绩好的 才让学发电报,电信组在邮局是最荣 耀、待遇最好的,只有电信组给安了 空调,别人都特羡慕。”何英姿说,“我 进来时是电报最昌盛的时期,当时电 报是邮局的主营业务,邮局有一半人 在做电报,夜班要从下午 3 点一直到 晚上 10 点,连站起来的功夫都没有。”

“老百姓之间的电报一般都是接 站或者婚庆嫁娶这类的急事,当天都 要送达,每天都要送到晚上 11 点。” 宋师傅说,“那时候,北京站必须凭 接站的电报才能买到站台票。改革开 放后,用电报联系买卖、进货、发货 的多了,电报内容有了一些变化。”

宋师傅介绍说,电报之外,长途 电话业务也曾经非常火爆。改革开放 后,外地进城务工、做买卖的多了, 通讯又不发达,人们只好去邮局打长 途电话。原来东四邮局有 6 个电话亭, 人特别多,都要排队等候。晚上 7 点 钟邮局关门,电报、长话柜台要延长 到晚上 10 点。

随着电话的普及,电报业务很快 萎缩。何英姿并入营业组,后来又转到 大宗组。宋师傅分到营销组。“现在 一个月仅有不到 10 封电报,都是发到 特别偏远的农村。到邮局打电话的也 很少。信件中商函占大部分,真正意 义上的家书也很少了。”宋师傅说。

题图为北京 V 信卫星通信地球 总站。北京通信信息博物馆提供

菏泽以牡丹闻名,村里很多人做

日新月异。

今天,在巍峨群山中,在广袤高 原上,当看到一个脸上荡漾着幸福 笑容的农民兄弟手拿移动电话,向千 里之外的亲朋好友报送佳音时,中国 移动人备感欣慰。随处可见的移动 通信铁塔,仿佛在向人们默默地诉说, 乡亲们日子多么幸福。



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的彝族姑娘在接听远方喜讯。



数字手机的出现,让“大哥大”、传 呼机在短时间内销声匿迹。我国通信 业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小小的手机是 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移 动通信业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带着这 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公司总裁王建宙。

从 193 万户固定电话到近 6 亿手机用户

记者:您是通信行业的管理者,同时 也是通信产品的用户。请从用户的角 度,谈谈改革开放 30 年来您对通信业 变化的感受。

王建宙:好的,我的确感同身受。 虽然一直从事电信工作,可直到 1987 年,我家里才装上第一部电话。当时经 济发展使电话需求快速增长,但供应 容量和设施严重短缺,于是装电话难, 修电话难,交电话费难。那时我在杭 州工作,有时几万人排队,排一天一 夜,就为第二天早上交电话初装费。 我在 1988 年用上 BP 机,1992 年用上“大哥大”,从此手 机越做越小,1994 年用上 GSM 数字 手机。今年年初,我用上 3G 电话。 当然,我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每次 使用新的通信产品都很早。

记者: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的通 信业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建宙:这 30 年,我从没有离开 过电信岗位,目睹了通信业翻天覆地的 变化。从用户数量来看,1978 年,全 国内地电话总数只有 193 万户,今 天,我国内地拥有近 6 亿手机用户。 光我们公司的手机用户就达 4.5 亿, 2006 年中国移动平均每月增长 500 万 户,这个数字在 2007 年就到了 600 万 户,2008 年变成 700 万户。

从行业领域来看,通信业发展初期, 我国主要靠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 设备,后来国内制造设备,再后来, 我们自主创新,有了自己的品牌和知 识产权,现在中国移动正在搞 TD-SCDMA,即第三代移动通讯。移动通信早期 定位是作为固定电话的补充,现在手 机便宜了,话费降低了,我们公司网 络覆盖我国 97%的人口居住的地方, 手机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中国移 动通信业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实现 了起步、起飞、腾飞的“三级跳”。

手机延伸了人体器官的功能

记者:移动通信从无到有,对少数 人拥有到全社会普及,对人们的思想 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什么改变?

王建宙:手机从早期的通话工具 延伸到短信,还有彩铃、下载歌曲、 手机报、手机搜索引擎、手机游戏、 手机定位等多种应用,它延伸人类的 耳、嘴和眼等器官的功能,改变人们 的生活、生产、经营、学习和娱乐方 式。

现在手机音乐有普通铃声、彩铃、 全曲下载三种形式。以前想听一首 歌,买唱片、磁带、光碟,就得连同其 上不想听的歌一起买。手机音乐不仅 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能保护音乐版 权,因为你每下载一首歌,交给移动运 营商一笔费用,再把它交给版权所 有人,杜绝了盗版。以前销量好的 唱片不过 100 万张,而北京奥运会 主题歌《我和你》当天被我们的用 户下载近 500 万次,到 9 月就超过 1000 万次。

手机能改变文化,一个有意思的 例子就是短信。1994 年就有短信业 务,大规模应用在 2000 年以后。如 今,短信改变了我们逢年过节的问候 方式,发短信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

当然,手机更能提高工作效率, 有事打手机,就能把事办好。村干 部可通过农村信息机与村民联络, 把天气预报、突发事件或致富信息 群发给村民。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 有手机,我们的生活将会怎样?

移动通信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

记者:作为大型国企,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在信息服务、网络普及等方面 是如何做到惠民、履行企业的社会 责任的?

王建宙:说到这里,我体会颇深。 我们履行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网络 覆盖上。近几年,在云南、贵州、青 海、西藏、新疆等偏远农村,投入 大量资金,没有路就开路,没有电就 用太阳能发电,把网络尽可能大范 围地覆盖农村。公司投身社会公益 事业,有资助贫困地区教育、举办贫 困地区中小学校长培训班、资助贫 困地区农村学校图书馆等很多项目。 从 2008 年开始,中国移动在 3 年 内投入 5000 万元,提供全国所有艾 滋病遗孤的生活、学习费用。

我们积极倡导环保和节能减排, 员工名片均为再生纸制造,我们有 1000 多个太阳能基站,在全球数一 数二。公司要求产品减少木材包装, 提倡废旧手机和废旧电池回收。如 果你的手机电池不用,可以给我们, 我们还给你一些小礼品,或给话费 补贴,然后集中起来循环加工。

作为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我们 投入 364 辆次保障车,完成全程 104 个城市 4 万公里的火炬传递通信 保障;突破零下 40 摄氏度低温极限, 在珠峰海拔 6500 米处建设世界最高 基站,保障圣火登峰通信畅通,以彩 信方式记录圣火登顶历史时刻,通 过我们的网络向全球传递;奥运开 幕式上成功保障奥林匹克中心区高 峰时段 26 万手机用户每小时 11 万 次的通话量。还有抗震救灾、破解 京津高铁移动通信难题等方面,我 们都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记者:最后,请您展望一下移动通 信的未来。

王建宙:手机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现在 20%的重庆市民不用买月票, 而是用手机“刷卡”,就能乘坐轻轨。 我们跟建设部在探讨,把城市取暖 变成可控的,而不像现在,屋里有人 没人,暖气整天开着,浪费能源。我 们可用手机遥控,回家前用手机发 指令,家里的取暖器就开了。再比 如,汽车上装一个普通 SIM 卡,厂 家随时掌握汽车运行数据,假如车 被偷,车主请厂家下个指令,汽车 就不会工作。在我国,SIM 卡拥有 率接近 50%,北京、上海、深圳、 广州等大城市超过 100%,但农村 普及率只有 20%多,因此农村普及 空间很大。究竟普及率多高才算, 我坚信,将来必定每个人都有一部 手机,它会将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 惊喜和精彩。

责任编辑:程少华

电话:(010)65368726

线索、评论请发至:mrbshgc@gmail.com